

# 话语的力量：毛泽东“五评白皮书” 的政治修辞分析

王辰瑶

**摘要：**研究毛泽东新闻作品的论文很多，绝大多数都将毛泽东的新闻作品视为新闻写作的典范，对其进行传统修辞技巧的分析。其实，毛泽东新闻作品的意义不在于新闻写作本身，而是应将其视为政治领袖通过公开媒体发声、进行广泛政治动员的话语实践。在媒体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这一话语类型理应得到更大的重视。借鉴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的政治修辞理论，通过分析毛泽东“五评白皮书”的新闻评论文本，尝试总结出这一具有强大力量的系列新闻评论所采用的话语修辞方式。同时也说明，对于毛泽东新闻作品的研究完全有可能转换范式，进入到更加广阔的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毛泽东；白皮书；新闻评论；政治修辞；斯金纳

**作者简介：**王辰瑶，女，副教授，博士。（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G2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4) 02-0022-05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这一日期前后，全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和会议，而新闻学界举办这样的纪念活动更别具一种情缘：毛泽东本人是中国第一个新闻教育和学术组织——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他一生高度重视报刊实践，亲笔写下过相当多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正因此，新闻学研究者不免有一种隐含的自豪，而其可能造成的倾向是，将毛泽东留下的新闻作品均珍视为新闻写作的典范和样本，要求新闻记者们学习。例如，在中国知网中以毛泽东新闻作品为分析对象的论文有百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范文赏析性质的，也就是以传统修辞术的方法来分析毛泽东新闻作品写作技巧，并要求或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新闻写作艺术。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新闻写作方式真的可以被新闻记者们模仿借鉴吗？似乎它与新闻记者的职业写作状态相隔甚远，即便记者可以在诸如“笔力纵横意丰厚”、“挥毫落笔生云烟”等抽象层面上有所“意会”，但这毕竟不等同于讲求具体和可操作性的新闻实务指导。由此促发笔者反思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毛泽东新闻作品的分析是否可以走出新闻范文的局限，转换一下研究的思路？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那就可以看到，研究毛泽东的新闻作品，意义并不在于新闻作品本身，或者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新闻作品的既有框框去套毛泽东所写的消息和评论，因为这样做恰恰可能会忽视毛泽东新闻写作最特殊的地方——这不是一般的新闻写作，而是领袖人物通过媒体所做的面向社会的、最为公开的话语。这一公开的话语类型，与其说更具新闻职业的色彩，不如说更是一种精心准备的政治行动，它是政治家面对公众所做的动员和劝服，是非常重要的权力实施过程。由于领袖人物的身份，这类借由媒介平台发表的公开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话语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家越来越需要直接面对公众进行动员和说服，这一话语类型势必会得到高度的重视。将领袖人物借助新闻媒体发表的公开话语视为一种独特的类型加以研究，目的不是总结新闻写作的技巧，而是要彰显权力与话语的关联，让人们看到政治权力是如何借由话语而彰显、宣示的。这么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探讨政治人物公开话语表达的智慧，对政治权力如何能更好地在话语中落实和体现有所启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公众理解政治权力与话语的关联运作，增强他们的政治素养和理性判断力。有鉴于

此，本文舍弃传统的范文赏析框架，转而采用政治与话语的关联分析框架，试图探讨毛泽东是如何通过新闻评论这样一种公开话语来进行社会劝服和动员的。

## 一、政治与修辞

研究政治与话语之关联，不能不提到修辞。在传统的文论中，修辞常被视为一种与“文采”相关的写作技巧，与立意、结构、角度等写作原则相比，修辞并不占据中心的位置。但是，在话语理论中，修辞却非常重要，它连接着社会生活的核心层面——政治。因此，前者的修辞往往被称为传统的“修辞术”，而后者的修辞却连接着一个绵长而重要的学术传统——“修辞学”。最早的修辞学就是在讨论政治与修辞的关系中展开的。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意识到了修辞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他们最初表达的是对修辞的担心。比如，苏格拉底看重的是私底下的、面对面的谈话，用精神助产士的方法，在对话中刺激对话者反思自己的主张，柏拉图在《申辩篇》中提到苏格拉底在演说开始时，称自己口才笨拙只会说真话，不会“流利地使用语言和精心修饰词句”。<sup>[1]</sup>所以修辞一开始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就带有负面的色彩。这种将修辞等同于政治人物的能言巧辩，并常常与不诚实、试图操纵他人等意义相连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其在近代的一个表现就是西方世界迄今仍然对“宣传”一词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亚里士多德反驳了这种观点，他的《修辞学》一般被视为系统修辞理论的源头。他提出了一个对后代政治理论影响颇大的观点，即真理仍需要修辞。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修辞主张被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继承下来，西塞罗和昆提良丰富发展了这种思想。比如西塞罗在其早期著作《论修辞学的发明》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智慧如果缺乏辩才很难有益于公民全体，而没有智慧的雄辩往往显得过于花哨却毫无益处。”<sup>[2]</sup>西塞罗把雄辩的语言当作人类联合的基础。总之，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政治与修辞都是密不可分的，在当今时代更是如此。既然希腊城邦的小国寡民不可能再现，那么我们就不能回避政治与修辞的关联，与其抨击它或假装看不见，不如分析理解，学习和反思。在直接将政治与修辞联系起来的现代研究者中，昆廷·斯金纳是非常重要的。斯金纳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贡献在于运用修辞的视角来研究政治概念的变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金纳认为修辞发挥着实现政治说服、获得政治行为合法性的功能。这种研究思路被有的学者称为“斯金纳革命”<sup>[3]</sup>。在翻译到国内的斯金纳的著作《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一书里，斯金纳在第一个部分总结了政治修辞的几个技巧，比如激发情感、把听众转换成观众、注重笑和讽刺、重新描述、使用比喻和借喻等<sup>[4]</sup>。但更重要的是，他提示了政治修辞不可局限于孤立文本，必须从语境出发进行历史的分析，因此剑桥学派也被称为“语境主义”的代表<sup>[5]</sup>。本文从这个思路出发，以政治修辞的视角分析毛泽东新闻评论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五评白皮书”。

## 二、“五评白皮书”及其语境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编辑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收入了毛泽东从1927年到1949年的28篇新闻作品，而已收入《毛选》1-4卷的还有28篇。在这56篇新闻作品中，1945年有10篇，1948年12篇，1949年一年就有22篇。毛泽东这三次发表新闻作品的高峰，恰恰配合着中国革命的高潮，这也说明毛泽东的新闻写作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紧密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形势”。<sup>[6]</sup>其中，“五评白皮书”是《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收入的最后5篇文章，都是毛泽东给新华社写的评论，一向被视为是评议风格大气磅礴的典范之作。这5篇评论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8月28日）、《“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用如此大的力量在短短一个月内密集地批白皮书？白皮书是怎样的文献？

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已经相当多，总结起来就是：美国政府为了从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转为“脱身”政策而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强烈批评蒋政府的腐败无能，强调美对蒋的失败无能为力且已经尽到了责任。尽管白皮书大量批评蒋政权，但出于继续争取美援的需要，蒋政府的反应相当温和，反倒是白皮书较少涉及的共产党方面反应强烈，不仅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写了五评，党内外人士都纷纷撰文抨击，形成一个高潮。<sup>[7]</sup>这里面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共已经明确了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不再需要在苏美两大国的中间地带游走观望和权衡；<sup>[8]</sup>另一方面，白皮书站在西方立场上对中共政权的性质颇多歪曲丑化，并且直接号召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与中共决裂。这对于一向重“名”的中国政治传统和注重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在战局已定的情况下，新政权要为自己的合法性正名的诉求不言而喻，而白皮书可以说正是一个送上门来的靶子。那么毛泽东如何在评论中完成这一任务？

### 三、“五评白皮书”的政治修辞策略

#### （一）重新描述：从具体事实跃迁到抽象理论

毛泽东在“五评白皮书”中采用了一个宏观的论述框架，一上来就从具体事实层面跃迁到了抽象的理论层面，拒绝与“白皮书”在数据、细节上争持，而对“白皮书”所论述的这段历史采取了完全的“重新描述”的策略。例如，第一篇评论《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开宗明义就给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行为定了性，称“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sup>[9]</sup>毛泽东在这里使用高度概括性的词“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完全跳出了“白皮书”用409页正文和645页附件洋洋洒洒百万言罗织的无数琐细事件构成的框架，直接跃迁到历史的“本质”层面。毛泽东在《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中随后给国内战争下了明确的定义——“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sup>[9] (1484)</sup>全文论述以及此后四文的论证都是在这样的宏观框架下展开，这实际上是将复杂的历史过程高度抽象为一个理论问题，即帝国主义为什么失败和中国人民为什么会胜利。

#### （二）诉诸必然性：唯一的革命道路

在上述宏观框架下，整个中国近代史不是对一场战争接着另一场战争、一个历史事件接续另一个历史事件的描述，而是高度抽象的两个集团及其代理人的对抗，这里面不存在历史的偶然性，只有理论或者说路线斗争的必然性。因此，整个“五评”都在阐述、论证以及反复强调毛泽东最初设定的问题——帝国主义为什么失败和中国人民为什么会胜利。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带领人民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例如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以设问的方式梳理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史：“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那么哪一个政府解决了“吃饭”这个大众最容易感同身受也最能代表革命成果的问题呢？很显然，只有经过了土改的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毛泽东自信地宣称，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功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sup>[10]</sup>

#### （三）情感动员：自信与矮化对手

斯金纳称，政治行动者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激发听众的情感。<sup>[11]</sup>那如何有效地进行情感动员呢？不同

的修辞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例如安托尼努斯认为情感动员首要的是安抚和赢得听众注意，而西塞罗和昆提良则强调应该唤起一种“更猛烈、更狂暴的情感”。<sup>[4](125)</sup>毛泽东在“五评白皮书”中采用的情感动员方式既非安抚，也非煽情，而是在自信和矮化对手的对比叙述中完成的。比如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堪称“五评”最著名的文章里，毛泽东用漫画笔法描述了一个“大使老爷”形象的司徒雷登——“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sup>[12]</sup>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在中国生活了50年，死后还把骨灰葬在中国。这样一位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人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却几乎只留下了一个夹起皮包走路的漫画形象，这里面不能不看到话语建构的力量。如果不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去评价的话，应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采用漫画式笔法并非仅仅为了讽刺挖苦某一个人，而是要通过矮化对手的修辞策略将对手放置在一个可以“藐视”而非“如临大敌”的位置上，在人们的奚笑中化解掉强大对手的压力。正如斯金纳引用的古罗马修辞学家昆提良的话，“笑声是削弱我们对手力量的一种特别有力的手段”。<sup>[4](209)</sup>运用幽默的描写、比喻、反语来激起笑声和蔑视，在毛泽东的文章中是很常见的，比如他在1946年会见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时所下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sup>[13]</sup>由此甚至还新造了一个英语世界中的流行词——Paper-Tiger。

与矮化对方相对应的，则是对自我的自信叙述。无论是《别了，司徒雷登》里“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sup>[12](1496)</sup>还是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sup>[14]</sup>类似这样的语句都流露出强烈的自信。所谓自信不是虚矫自傲，前者承认困难并认为自己能克服困难，后者则不否认困难存在的事实；前者不在意谩骂，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后者则对一切负面评价都极其敏感。

#### （四）教而化之：说服与认同

说服是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者甚至认为，修辞以“说服”为目的。<sup>[15]</sup>如何说服听者？修辞学理论认为应该让受话者对说话者产生“认同”的感觉。美国修辞学大师肯尼斯·伯克就此提出了三种认同策略：同情式认同，对立式认同和虚假认同。其中同情式认同是说话者旨在让受话者从情感上认同自己，认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是“自己人”；对立式认同是通过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使听众凝聚起来，“同仇敌忾”；虚假认同则是使听众在无意识中与说话者达到认同，比如，女性在看到由气质高贵的张曼玉代言的广告时，容易“误同”自己用了广告中的化妆品后，也会变得像张曼玉一样高贵优雅。<sup>[16]</sup>但是毛泽东在“五评白皮书”中采用的认同策略不同于上述任何一种，而是更基于中国传统色彩的“教化”认同。且看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连续使用的段落：“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sup>[12](1494,1495)</sup>这些论述均是针对那些“白皮书”中所冀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论述的目的是批评、教育、改造。因此，它既不是站在同一面的迎合、拉拢，也不是站在对立面的排斥、鞭挞，而是针对可以团结与改造好的对象的“教而化之”，这种修辞策略对于熟悉毛泽东整风运动理论和思想改造话语的人们来说，应当也是毫不陌生的。

## 四、结 语

总之，“五评白皮书”是政治领袖在特定时刻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进行的一次公开话语行动。从“五评白皮书”产生的语境和需要完成的目标来看，毛泽东的政治话语充分彰显了力量，收到了极强的政治效果，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作为一名政治家高超的话语掌控能力和对修辞策略的娴熟运用。在

“五评白皮书”中，毛泽东首先采用了“重新描述”的策略，将“白皮书”用百万言详述的历史事件和细节转换为高度概括的理论问题，并在“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建立起唯一革命道路的叙述逻辑，以此完成对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合法性的正名工作。此外，毛泽东在“五评白皮书”中还精彩地运用漫画笔法和幽默的力量，激起笑声和蔑视，矮化对手，增强自信，并且针对需要教育和争取的对象采用了既批评又团结的教化策略。可见，“五评白皮书”体现出的话语力量，来自政治行动者对政治话语发出语境与任务的明确以及在不同情景下灵活运用修辞策略的能力。

正如上文所说，政治领袖的这类公开话语，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话语类型，研究者完全可以突破现有分析框架的局限，采用更加开阔的研究视角，从多个角度解读其话语形式、语境和策略，这样才能达到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深层理解，并对现实的政治运作和社会认知提供必要的借鉴。

### 参考文献：

- [1] 胡全威. 修辞与民主：亚里士多德论政治修辞 [J]. 政治思想史, 2013 (2).
- [2] 卡里·尼德曼. 修辞、理性与共和 [A]. 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 [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0.
- [3] 张芳山，涂宪华. 从观念到语境：近代西方思想史研究范式转向——兼论“斯金纳革命”对思想史研究的贡献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 (12).
- [4] 昆廷·斯金纳. 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与修辞 [M]. 王加丰，郑崧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4；145；192；209.
- [5] 孔新峰. “语境”中的“语境主义”：昆廷·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发微 [J]. 政治思想史, 2010 (1).
- [6] 刘济民. 论毛泽东新闻宣传的“三大战役” [J]. 宜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1).
- [7] 林利民. 1949年美国政府编纂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原因与国共美三方政治反应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 (2).
- [8] 杨奎松. 革命（壹）：“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89.
- [9] 毛泽东.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A].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3.
- [10] 毛泽东.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A].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1.
- [11] 李见顺，黄其松. 论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修辞分析方法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 (11).
- [12] 毛泽东. 别了，司徒雷登 [A].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96.
- [13] 毛泽东.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A].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95.
- [14] 毛泽东.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A].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02.
- [15] 王孝勇. 吕秀莲自我辩护的语艺分析 [J]. 新闻学研究, 2004 (夏季号).
- [16] 韩志玲. 《奥巴马上海演讲》的修辞分析——基于伯克的同一理论 [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3).